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来源集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2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2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2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614-6506-6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5024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22)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506-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 | | | |
|---|------------------------|-----|
| 1 | 在当代艺术生产与文化旅游产业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 尹建华 |
| 3 | 他国化与中国文论研究 | 曹顺庆 |

当代艺术现象及理论研究

- | | | |
|----|--|-----|
| 15 | 艺术的必然性：
恩斯特·费歇尔的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思想 | 傅其林 |
| 27 | 中国当代艺术的“沙龙精神”与“公共领域”
——以“成都春沙”（2004—2012）为例 | 彭 彤 |
| 35 | 何谓“当代艺术批评”？
——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三重属性 | 支 宇 |
| 45 | “物”的解放与形式的抵抗
——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13)的政治 | 鲁明军 |
| 55 | 早期中西文艺思想中的艺术地位问题 | 胡 洪 |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 | | |
|----|-----------------------------|-----|
| 65 | 创意与人文精神 | 吴景贤 |
| 72 | 艺术与垃圾：
当代艺术生产与文化产业论纲 | 龚鹏程 |
| 79 | 意义的交流与音乐文化产业
——以歌曲流传机制为例 | 陆正兰 |

现代性与文化设计理论研究

86	许燎源的意义 ——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	吴兴明
97	文化产业定位思考	邱晓林
104	现代性分化与后现代解分化： 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型	陈佑松
119	文化设计：回到当下的形式创造	邹 波
128	生产美学“何去何从？”	张郑波
144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思想路向的理论重构 ——以《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为核心	叶昱辰
155	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再思考	韩 旭
162	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视野的建构及其延伸 ——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为例	柳改玲
172	规范性基础的消解 ——从哈贝马斯看几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罗金成
182	当代艺术生产与文化旅游产业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张一骢
195	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 ——评刘文斌的《文学民族精神论》	杨 淳

在当代艺术生产与文化旅游产业 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成都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尹建华
(2012年7月7日)

尊敬的邹部长，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向莅临成都参加今天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艺术生产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时代潮流。近年来，生机勃勃的旅游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领域，当代艺术生产如何与文化旅游融合互动，两相共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已成为产业界、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了“文化强国”的总体战略，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作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去年，省委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将成都市作为全省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并把文化旅游业列为重点行业之一。成都市委提出了建设“文化之都”的奋斗目标，将文化旅游业和艺术品原创业纳入重点发展的优势领域。国家、区域和城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为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成都文旅集团成立于2007年，是成都市以文化、旅游、体育为主营业务的国有骨干文化企业，承担全市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产业运营和项目投融资的产业平台功能。组建5年多来，以精品文化旅游项目为着力点，坚持文化引领、融合发展的理念，坚持以文化旅游带动城市更新和区域发展的模式，坚持走市场化、专业化、国

际化的发展道路，积极尝试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为了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探索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科学发展的路子，文旅集团将携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整合共享优势资源，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搭建当代艺术和文化旅游产业理论研究与成果推广的新型平台，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发展。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历史积淀深厚，人文资源富集，“天府之国”的生态本底得天独厚，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沃土。今天的论坛只是文化旅游领域高端学术交流的开始，今后还将逐步探索建立常态化、国际化的交流机制。真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点拨、指导成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期待今天的论坛结出丰硕的成果。最后，祝各位嘉宾在蓉期间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谢谢大家！

他国化与中国文论研究^①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曹顺庆

文学的他国化在比较文学界还没有人提出来，是我提出了变异学才有的课题。文学的他国化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变异学的重要观点，它是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个案与接受造成的变异。这种变异会最后形成别的国家的文学，我们称之为他国化。他国化的方向主要是在文化影响中接受国的文化可能消化外来国文化，把它变成接受国的文化，我们有一个讲法叫本土化或者叫中国化。比如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个方向实际上早被学术界肯定。比如我们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级学科，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我最早提出来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的课题，后来教育部将中国文论西方化作为一个重大的招标项目。文学的他国化必然涉及本土化的问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有没有，肯定有。只要大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西方文学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是推不翻的，实际上也推不翻，它有一个学术道理在里面。我们刚才讲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禅宗就是印度佛教或者外来文明的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西方文学的中国化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尤其在我提出失语症后，有人与我争论，说曹顺庆你说我们都失语了，我们没有古代那一套了，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传统，其中就包含着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五四以来，我们尽管没有传统文化，但我们按照西方的东西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来的中国现代的新诗，尽管我们用的西方话语，我们写的新诗、散文都是中国的嘛，它不是外国的嘛。所以我们没有失语。他们是这样讲的，其实这当中已经暗含了西方文化中国化。但是什么才是中国

^① 本文根据曹顺庆先生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化,化到哪种程度?什么才是他国化,标准是什么?我等会儿再讲。另一个,本土的文学受外国的影响,向外国变化,具体来说是文学西方化或者东方文学的西化。东方国家的西化,这是我们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一个热闹话题,包括现代西方的后殖民主义都是如此。它实际上涉及东方文化西方化,也涉及西方文论怎样变成普适性的问题。实际上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西方化过程。中国文学的西方化也不可否认是这么一个历程。所以我们这一百多年来在讨论到底西化还是中化,还是要不中不西化,有全盘西化派,有顽固中国保守派。但不管怎样说,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今天我重新从变异学来看,那就涉及他国化的问题。西方文论传入中国后它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文化西方化。大家肯定马上困惑了,到底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西方化,我们怎样来判断他国化?他国化的根本的是一个“化”。什么才是根本的东西呢?我们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支撑它的一个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是它的学术规则,这个学术规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按什么学术规则来,大家知道西方和中国是有不同的学术规则的。大家都知道西方有学术规则,大家都感觉得到,但摸不到。中国有中国的学术规则,西方有西方的学术规则。这个学术规则一谈就深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道与逻各斯》,在我的书《中外比较文论史》里,就有一节“道与逻各斯”,也就是我们学术规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道与语言的关系,和西方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完全不同。我们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我们认为道是不可说的,语言不可以表现道,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学术规则。因此我们才强调搞文学理论的要超越语言,我们讲得免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们经常说象外之象、韵外之旨、言外之意。为什么禅宗讲“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而印度不讲?他们只讲因明学。我们禅宗完全不强调文字,强调顿悟。这已不再是印度的了。而西方的逻各斯强调语言与意义是一致的,没有意义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意义。不可能有没有意义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意义。后来发展到更厉害的一种本体论, meaning and language 的问题。他们认为语言产生一切,借用海氏讲到“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再比如说西方从逻各斯的角度,讲究一个明晰的、清晰的逻辑思维,讲究一个体系,要讲究范畴式的研究。这个东西一拿到中国来就没有了。有人说《文心雕龙》也有体系呀,但是为什么一提到风骨就讲不清?按照西方的定义或者范畴就讲不清楚,风骨是内容、形式等,都说不清了。后来黄维梁就得出一个开玩笑似的结论:刘勰在写《风骨篇》的时候喝醉了。

学术规则就是一种话语。我们在言说的时候,在表述的时候,用哪种话语来表述,它的话语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基本话语在表述的时候,它就涉

及基本意义的生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生成它的意义？一讲到意义生成大家就蒙了。中国自古以来，从先秦到现在，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意义生成方式，我把它总结成依经立义。什么是依经立义？不管中国的各个时代理论千差万别，都是一种对经典的阐释。从早年的经学，到魏晋玄学（玄学有三玄，易、老、庄），到宋代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考据学，这都是一种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西方也有圣经学，到后来的阐释学。并不是中国才有。《孝经》说：“非先王之法不敢法也，非先王之言不敢言也。”这是一个典型的意义生成方式。另一个是无中生有。意义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无中生有的。无可以生有吗？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从老子、儒家到道家都有。从老子开始就讲无中生有。老子讲“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在文学理论中又叫“虚实相生”，我们实有的东西还不是全部，通过实有的东西看到象外之象。我们画一条鱼，不画其他东西，从鱼的生动姿势就可以看出水来。我们中国的演戏也是如此，可以不用道具，走上来，“咚咚”两声，门就出来；拿一条马鞭，马就出来了；拿一条桨，河就出来了。我们这种意义生成方式与西方的不一样，西方也受到我们的启发，比如布莱希特的间离化就是从中国而来。这些东西一写进去就深了。学术规则在哪里，话语方式在哪里，意义生成在哪里，只有把这些东西思考深了才能讲清楚。只有把这些学术规则、话语方式与意义生成方式思考透了，才能讲清楚。佛教其实最初是有因明学、逻辑学，后来走向中国话语，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它走向无中生有。禅宗就是典型的无中生有。还有一种是立象尽意的方式。比如禅宗讲“不立文字”，比如我们现在来上课，我们“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并不是我们大家都不讲话，比如有一个同学发话了：“老师，佛的本质是什么？”用他们的话来说“如何是佛法大义”，老师答“春来草自青”。这儿“春来草自青”就是一种立象尽意的方式，让（你）自己从这句话中去悟。这些东西有好多。这就是话语生成方式。西方的话语生成方式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比如我们讲失语症实际上就是讲一个学术规则的问题。

那么哪些是中国化的，哪些是西方化的？我给大家举个例，比如说王国维就是典型的既有中国化又有西方化。同一个人都可能出现中国化与西方化。两种倾向在一个人身上可能都有，在我们的整个文化中都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典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个个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受了西方的影响，是典型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案例。他在里面是吸收了西方文论的，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他把西方的理想的、写实的写进来，相当于我们讲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的观念。但王国维的基本学术规则与话语方式是中国的。什么话语方式呢？诗话、词话的话语方式。什么学术规

则呢?“subject/object”，主、客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文学中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西方是对立的。比如艾伯拉姆斯写了一本书叫《镜与灯》。现实主义是镜子一样反映现实，浪漫主义像灯一样投射情感。换句话说，浪漫主义完全是一种“subject”，与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现实主义就是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比如巴尔扎克说要做书记。但是王国维引进后就把学术规则改了，大家看《人间词话》：“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有理想的，有写实的，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修改过来就是中国的了，因为中国从来都强调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比如说我们读《文心雕龙》，大家一看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物色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比兴篇》：“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又，在刘熙载《艺概》中有：“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两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换句话说，主观与客观合一是中国基本的学术规则。王国维把西方的东西拉进来，用的是两分法。我们很少用两分法，我们都是一分法。一个东西他把它拉开来，有理想的，有写实的，但他认为两者是结合的。他把西方的学术规则都改了，改成我们主客观统一。整个《人间词话》的主线，他一开始就提出来，有“理想”的，有“写实”的，他就讲哪些是理想的，哪些是写实的，“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然后他紧接着进一步分析下去，讲“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些是“有我”的，有些是“无我”的，“有我”、“无我”也是根据两分法分开来的，已成为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然后从“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来看，“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看上去好像是从西方拿的，其实他是把西方的规则改造，既吸收西方的东西，又化西方的东西，从学术规则到话语方式，因为他是用诗话的方式写下来，绝对不能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西化的东西，但是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的东西。《人间词话》是很薄的一本，如果与传统的词话如《蕙风词话》、叶燮的《原诗》、《沧浪诗话》等来比，如果从传统的角度来讲，那算不了老几，只能算是小拇指了。《人间词话》伟大在哪里呢？它与传统的东西不同，它把西方的观念引进来，但又不是硬套西方的东西，而是用我们的学术规则、我们的话语方式，融会西方的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个案，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现在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光是研究《人间词话》拿到博士学位、当教授的人就不少。但是研究我们其他的词话意义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了，为什么呢？《人间词话》是

一个中西交汇的舞台。什么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个典型案例。

什么是中国文论西方化？王国维也有中国文论西方化的案例，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典型的中国文论西方化个案。同一个人有两种情况。《红楼梦评论》就是采用西式的论文方式，它的核心观念、基本学术规则就是西方的：叔本华的生命悲剧意识。他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中国文论传统的方式向西方的学术规则靠拢，向叔本华的思想靠拢。再看他基本的话语方式，是西式的论文方式，基本的学术规则向叔本华靠拢，就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我们的基本动力，我们生存的基本价值、意义，其实就是欲望。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欲望，欲望又推动我们去实现欲望，但是欲望总是失败的，失败就是痛苦，所以人生就是痛苦。这就是叔本华的基本意思了。就是人生活在世界上，他就表现为一种意志，意志总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能满足欲望，人就是失望，就是痛苦，所以我们人一生就生活在痛苦中。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最好的东西，都想当官要当最大的，发财要发最大的，找老婆要找最漂亮的，找老公要找最帅的。找得到吗？不看看你自己，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大家都要失望，失望就是痛苦。所以这个痛苦是人自己造成的。叔本华甚至认为，死才是人的痛苦消失的时候，死亡就是痛苦的消失。叔本华有句名言说：“要是有人敲坟墓的门，问死者愿不愿意再生，他们一定都会摇头谢绝。”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欲念的目标一旦达到，就绝不可能永远给人满足，而只给人片刻的满足，就像扔给乞丐的面包，只维持他今天不死，使他的痛苦可以延续到明天。”他今天吃饱了，明天又饿了，所以人永远在痛苦中。他把这样一个观念用来评价《红楼梦》，说《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红楼梦》所谓“自作孽，自解脱”。这个欲望从一开始就有了，贾宝玉含的那块玉，他身上不是有块玉吗？“玉者，欲也”，讲《红楼梦》怎么通过欲望的不能满足（而让人痛苦）。贾宝玉明明爱着林妹妹，就不让他满足嘛，然后两个人痛苦得不得了，就是悲剧。他最后通过叔本华这种观念，来证明中国文学《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思想是一致的，证明叔本华的思想是正确的，是普适性真理。《红楼梦》很伟大，“《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为什么《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呢？他（王国维）有一句话一说出来就说错了，他说《红楼梦》“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即这《红楼梦》跟中国精神是相违背的。那中国精神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精神是乐观的、乐天的精神，我们“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就是说中国精神是乐天的，没有悲剧情节。中国人从来认为，你困顿、困难，以后亨达了。你先是很困难，想追漂亮的女孩追不到，最后总会追到的。落难公子总是在

后花园找到小姐，最后又被搞掉了，搞掉了后考上状元，你家老丈人要主动把女儿嫁给我，都是这样的情节。那么《红楼梦》是不是这样？《红楼梦》是相反的，这就是悲剧。他这句话从逻辑上就错了。为什么从逻辑上就错了呢？因为《红楼梦》又不是天外的“飞来峰”，《红楼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红楼梦》是生长在中华文化土壤之上的，它怎么会跟原来的传统完全相背呢？为什么会“大背于吾国之精神”呢？这句话讲不通呀。这是《红楼梦评论》的一大硬伤，很可惜学术界根本没有对这大硬伤好好进行反省、批判。为什么王国维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呢？他不懂中国文化吗？王国维绝对懂，王国维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是大学者、国学大师，怎么会不懂中国文化呢？中国文化有没有这种东西？肯定有！中国文化假如没有《红楼梦》这种精神，中国《红楼梦》怎么会产生？这种生命悲剧意识，我们从老子一直到庄子，一直到苏东坡、嵇康等身上都有。老子有句话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这句话的深层意思就是说我有身体，有身体就有欲望，所以有“患”这种东西。庄子说得更明确：“人之生也，与忧惧生。”说人一生下来就与欲望俱生。“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君子殉名，小人殉财，就是说我们都要为这些去争。俗话说：“鸟为食死，人为财亡。”小人就是求财去，君子就是求名去，欲望增长，所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悲剧的过程。这个庄子讲得非常清楚。生命悲剧意识从老庄一直到后代很多人都有。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充满悲剧生命意识。这个王国维老先生居然认为没有，那就很奇怪了。他之所以会形成这个看法，实际上他就是根据西方观念，根据叔本华观念。不是他不懂中国文化，而是他为了符合西方的观念和规则，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自觉不自觉的，甚至歪曲了中国文化的原貌。歪曲了中国文化的原貌说起来大家不信，其实是真事。比如说，紧接下来一个例子就是朱光潜。

朱光潜是中国文论、文化西化的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朱光潜写了一本书叫《悲剧心理学》，他在《悲剧心理学》中说，中国没有悲剧。刚才不是讲到《赵氏孤儿》吗？西方都认为《赵氏孤儿》是悲剧，他说中国没有一部是悲剧。“中国的元杂剧有五百多部，没有一部是悲剧的。中国的戏剧就是喜剧。”这就是他在《悲剧心理学》里面写的，很好。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认为，他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也说得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人也不同意这个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就是有悲剧的，只是中国的悲剧方式跟西方的不一样。比如中山大学搞戏剧的王季思，他就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你说中国没有悲剧，我选十大悲剧给你看。像什么《窦娥冤》、《赵氏孤儿》、《清忠谱》这些都是悲剧。在中国

有没有悲剧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不必苛责朱光潜，因为见仁见智，你可以说有，你也可以说没有，我们认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关键是朱光潜为什么认为没有悲剧。他就继续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悲剧呢？因为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就说严重了，中国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那我们今天搞中国哲学的那些人都是傻子吗？冯友兰他们都是傻子吗？中国没有哲学，你们怎么研究中国哲学呢？这句话就说过分了。

朱光潜是中外皆通的，他对中国文论很懂。中国没有哲学吗？他肯定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乱讲？中国没有哲学这个看法很奇怪。看到朱光潜讲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能理解王国维为什么会乱讲，可是他为什么会乱讲呢？他不懂中国文化吗？我觉得他是站在西方学术规则，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说中国没有悲剧，王国维也是这样的。用西方的悲剧规定——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一定是毁灭性的才是悲剧，所以他才说中国没有悲剧。不符合西方的悲剧规律，当然就没有悲剧。换句话说，他们把西方的学术规律当金科玉律，站在西方的学术角度来讲，确实中国也没有哲学，这句话是大哲学家黑格尔讲的。黑格尔讲得比朱光潜好一点，没有这么绝对，他认为：《老子》还是有思辨性的，《周易》还是有思辨性的，但是你们的孔子的《论语》，一点思辨性都没有，完全谈不上哲学，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就是伦理学。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这个东西谁都写得出来，西塞罗就比他写得好。然后他还回过头来讽刺孔子，他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你翻译过来，让我黑格尔看穿了，被西方人看穿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的偏见，他们站在他们的学术规则上，认为哲学就是应该有思辨性的，他们用这种观念来看，朱光潜就受他们的影响。其实上他“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就是搬黑格尔的，用西方的学术规则来看，中国确实没有哲学，中国确实没有悲剧。

怎么样判断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这要从学术规则上来看。学术规则清楚了，我们讲“他国化”的问题，才能找得到根基，否则大家找不到根基，都不知道怎么讲。我说过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成立之日起，就是我们中国文论死亡的开始”。我的观点很火爆，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批评死”。

在山东《文史哲》，我们开一个会，我讲完以后，网站和报纸就炒作起来。《中华读书报》就写，曹顺庆说文论“史”就是文论“死”。这个观点很火爆，但这个观点有没有它的意义呢？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以后，它就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在现实文学创作和现实文

学评论中不起作用了，换句话说，就死掉了？自从我们有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以后，中国古代文论就进了博物馆，就成了学者案头的材料，成了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再也在现实生活中不起作用了。比如，作家搞创作，评论家写论文，我们都知道研究文学的评论家写论文，没有几个是按照中国古代文论的规则来写的，我们都按照西方文论的规则来写。这里边冒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中国文论的元语言地位被取代，“元语言”英语叫“metalinguistic”，就是“语言的语言”。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要探讨“语言的语言”，就是统治我们日常说话的规则。我们日常说话千变万化的语言叫做“言语”，统治言语的规则叫做“语言”，我们普通讲话千变万化，不仅有普通话，还有各种方言，不仅有中国语还有外国语，日语、韩国语等，什么语言都有，但是任何语言都服从一套基本规则，都有主谓宾定状补，都有基本的语法。在这些基本的语法规则下面，大家才有具体语言，规则统治语言，所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就要把它的规则抽出来。

那么，我们文学上面有没有元语言呢？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的元语言，文学理论就是从文学作品中抽出来的规律，然后，它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创作，就像语言学规律是从具体语言中抽出来，但是它又在指导着我们的具体语言，这就叫“元语言”。文学理论，它作为文学的“元语言”，应该和文学水乳交融，我们中国文论所谓的“西方化”，第一个“坎儿”，就是我们的“元语言”地位的变化，元语言地位的丧失，然后它才变得对象化和材料化。最后要用什么元语言来研究中国文论呢？要用西方的元语言来研究中国文论，所以中国文论被对象化，这就是一个文学的两面，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和它的被对象化。我们最后要用西方文论来研究中国文论，这种东西你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怎么用西方文论来研究中国文论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研究“风骨”，我们要用“内容”和“形式”来分析，“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或者反过来说，“骨”是内容，“风”是形式，我们一直这样研究，研究起来就驴唇不对马嘴，因为它是不同的话语规则。中国文论丧失了元语言地位后，最终就对象化、材料化，就变成“秦砖汉瓦”，变成西方文论“元语言”下的材料。

（关于）我们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可以写文章描绘丧失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考古”。中国文论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有人得出来的结论是中国文论本来就没有用，这个话是胡说八道，它本来确实是有用的。为什么王国维就可以用呢？《人间词话》就可以用好这个东西，在西方文论没有传来之前，中国文论是有用的，有些中国文论在国外也有用，比如说意境、意象，意象这个东西不是催生了西方“意象派”吗？“意境”我

们今天还在用,尽管是在西方文论中在用。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没有到来之前,它是个活泼泼的东西,它一直指导我们的创作,包括我们创作出唐诗、宋词、《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伟大的作品来,这都是在传统文论指导下产生的。而我们学了西方文论以后,我们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创作《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的时代。我们换了元语言以后,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另外一个高度,换句话说,传统文论是有用的,传统文论是有效的。它作为一种话语是有效的。它怎么会突然没有效呢?现代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死了”。我以前讲课,一个同学提出来,他一直坚信每种文化都有它的周期,中国文化到了它的生命周期,那它就死了,死了就死了嘛,死了就另外换一种!他是这样一种看法,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文论本来就是死的,你想把它救活,救不活了,时代不一样了!虽然时代不一样了,在同样一个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中国文论还在部分地存活,比如说,在钱钟书笔下,《谈艺录》、《管锥编》都是用的传统的方式。我们现在说他“高山仰止”,现在很多人吹捧钱钟书,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和钱钟书格格不入的人。

在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中,传统文论还活着,比如说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使用的是传统考据法。他为什么会使传统文论还活着?那就是元语言的地位问题。元语言问题,这是一个创新性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来过。元语言被替换掉,大家还可以找出别的例证。元语言被替换掉的问题,吴兴明原来提出来过,讲到中国文论被整体替换,但还没有讲到元语言这个高度。讲到“元语言”就带有哲理性了,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为什么古代文论成为一门学科反而死了?古代文论不是被学科搞坏了,而是元语言被取代了,被对象化和材料化了。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问题,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和它的生命力的问题。它的生命力在哪里呢?一种理论它肯定要作为元语言才能存活。当我们抽掉这种元语言,被其他元语言取代后,那当然它就对象化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以讲西方文论作为中国文学元语言的历程的考古,西方文论怎样成为中国文学的元语言?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历程,要做考据,我们要一点一点把它考证过来,中国文论作为元语言丧失的这样一个历程。西方文论怎样成为中国文学的元语言,怎么样统治中国文论?中国文论西化的历程,要把它描述出来,这个描述是属于考据性的,要从最早的西化开始,西方文论最早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它又是在怎么样取代中国文论?什么时候它全部地取代中国元语言?它有一个逐步侵入的过程,要用具体实例来说话。西方语言怎么样逐渐地取代中国文论成为我们的元语言,这个历程要怎么样地描述出来,要用实例来说话,要写一些实证性的文章。

第三点是，我们可以找一些个案性的东西，比如说俄苏文论的中国化历程。俄苏文论是一个西方化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俄苏文论已经逐步地中国化，我们还可以讲一些具体的看法，比如说典型论。典型论是怎么样从一个西方的理论慢慢变成中国的理论？刘再复专门写《性格组合论》，成为典型论中国化的一个个案。还有，西方的理论如何中国化，李泽厚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李泽厚写的很多东西，已经西方化，比如说他已经把人格的集体无意识融入他的《美的历程》这本书中，但是在这本书中，也有中国的学术规则在里面。这些个案，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战及其中国化，最后毛泽东提出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大家都可以写这样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

第二个大的方面是学术规则的西方化。学术规则西方化的个案引进，第一是科学主义这一个问题。大家注意，科学主义这一问题，还没有人敢提出来过。这一问题跟元语言一样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可以研究这么一个问题：唯科学主义，中国文论非科学化形象的确立。什么是唯科学主义呢？我们五四以来，最没有人敢打，最坚信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关于“science”从来没有人敢怀疑过，唯科学主义是悬在中国文明和文化上的一把刀，这把刀造成了我们非常严重的文化和文明的失落。我们给大家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则是中医的问题、针灸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要否认中医呢？理由是因为它不科学。是否在西医没有来之前，中国人都死光了呢？中医其实有它的客观依据，目前针灸已经被西方承认。西方的科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要做一个东西可以重复做，针灸扎穴位可以重复做，今天扎是这样，明天扎也是这样，张三扎是这样，李四扎也是这样，那么针灸就被认定是科学的，可以医病。但是针灸挂牌行医以后，给西方科学造成了一个大难题，针灸治病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是经络，那么经络是什么？解剖开来什么都不是，既不是血管，又不是神经，又不是肌肉。为什么这块肉就是穴位呢？实际上就存在必须选择的两条路，一条路是重新否定中医，就有人说你们是胡扯，是非科学的。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医都是反对科学的。重新回到科学的道路，把中医打死。另外一条道路是承认中医，即便西方的“science”也没有认识到某些路径，针灸确实能够治病，这是科学也无法解释的，这也说明科学有力所不及的地方。换句话说，除了西方的“science”外，还有别的路，还有一条通往罗马的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正如西方认为，语言和意义是一致的，语言是不能脱离意义的，但还有一条路说语言是可以脱离意义的，可以不用语言来表示意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就是基本学术规则问题。